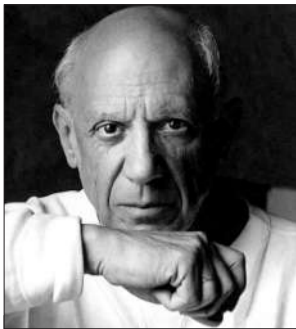


# C04 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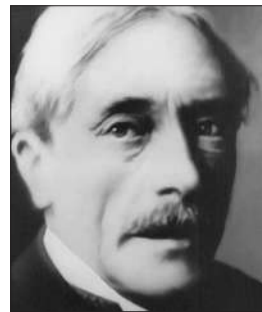
被蔡元培聘到北大外语系任教。



与毕加索友谊深厚,曾用中文为毕加索的画题写诗句。



受邀与胡志明共同参会,成为朋友。



《我的母亲》法文版受瓦雷里激赏,瓦雷里为其写万言长序赞扬。



受罗曼·罗兰的邀请,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妇女自由和平促进大会”。

盛成对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他传奇的一生早已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他的诗作在今天的中国诗人当中也仍在发挥影响。在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中国诗歌协会、中坤诗歌发展基金联合举办、上月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亚洲诗歌节上,中国诗人唐晓渡向土耳其诗人介绍了这位神秘而传奇的中国诗人,解读了他的诗中那种“神奇的动力”。



徐悲鸿为盛成画像,曾为其介绍对象。



跟随欧阳竟无学佛学和国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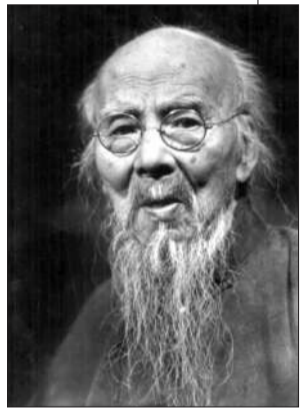


纪德赞扬盛成《我的母亲》是地方文学的一个典范。

被蒋介石内定参与东北外交;蒋称“盛成很有一套”。



齐白石为盛成与首任妻子郑坚的证婚人。



## 盛成 不断获取“神奇的动力”

我们相聚在这里,相聚在横跨欧亚大陆,荟萃欧、亚、非三大洲文化的国际都市伊斯坦布尔,本身就是有关“跨文化与诗歌”的一个活生生的阐释。跨文化的努力不但不会掩盖,相反会突出我们各自的主体差异性;同样,它不但不会钝化,相反会激励我们直面各自不同的“问题情境”并探索解决之道。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诗人和作者,正是在这种跨文化的交往中,不断获取某种“神奇的动力”。

“神奇的动力”一语出自一位中国诗人的诗,事实上它正是这首题为《嬗变——致保罗·瓦雷里》的诗所致力揭示的秘密源泉。反复出现的省略号表明,诗人的笔似乎总也跟不上他内心奔突的思绪。“每一种生命和物质……影像和镜子……”,“知识……责任……权力……意志”——除了不断在语言上腾身飞跃,他又怎么能抓住那同时容纳了这一切的力量在极度宁静中兀然显形的瞬间?令人惊奇的是,如此巨大的能量,如此紧张的嬗变过程,在第二节中却被汇聚于一群“蠕虫”:

当神奇的动力运转起来,向前推进着的时候,一千个萌芽,齐声歌咏着它们的每一份命运。/蠕虫,娇小的蠕虫,从它们隐蔽的洞穴里酣眠的胚芽里/破茧而出……啊,蠕虫,……激情的力量!/你们吞噬着林木和它们正在变红的肌肤。/你们吃着,你们蜕变着。你们侵蚀着理性

### 鲜为人知的传奇人物

我很高兴能在这里谈及作者盛成。由于长期受到有意无意的遮蔽,即使是在座的同胞,恐怕大多也未必知道这位集诗人、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中国现当代史上的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传奇性有太多的话可说,譬如十一岁即以出家人身份秘密加入同盟会,次年参加辛亥革命光复南京的战斗,受到孙中山的嘉奖;譬如二十岁就作为铁路工人代表投身五四运动,与周恩来等结为亲密战友;譬如赴欧勤工俭学期间既狂热卷入达达主义运动,成为其唯一的东方要员,又参与创建法国共产党,并任法共南方地区兰盖道克省(Langnedoc)省委书记……然而,我今天之所以谈到他并非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他作为中国自有新文学以来真正以作品名动世界的第一人,同时又是跨文化写作和交流的绝佳典范,是因为他这一生都与他笔下那“神奇的力量”相伴相生,从未失其自由和创造的灵魂。而我之所以感到高兴,是因为八十二年前,即1930年,他曾作为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特别邀请的客人到访过土耳其。当时他们会面的地点是新都安卡拉,但客人取陆路来自法国,肯定途经了伊

斯坦布尔。我愿意想象,此刻他也是我们中的一员。那次盛成受邀的缘由不是诗歌,而是两年前来他那一经出版即轰动欧洲文坛,被称为“一时盛事”的长篇小说《我的母亲》。此外,同为“革命者”大概也是一种深层的精神维系。然而对盛成来说,小说和诗歌,诗歌与革命,其间的分别远不如通常认为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万物为一”“天下殊途而同归”的存在原理,那是真正的大诗、原型之诗。事实上,盛成确实是把《我的母亲》作为一首“大诗”来写的,其自我期待是“要有《神曲》的精神,要有《第九交响曲》的音调”,应当成为“饿肚子的朋友,痛苦者的知音”,它将是一首“人曲”;而在纪德、罗曼·罗兰、萧伯纳、海明威等他的朋友们看来,这部作品的精髓也在于“通篇闪烁着诗歌精神的光亮”。不必说,那在《嬗变》一诗中透入“阴翳的深渊”,使“沉默的、孤独的纽扣,在忧郁的心灵的阴影中,哭泣着延伸出枝节,在远处飞翔,凝视着情感之树”的,当是同一种光亮。一个心中怀有这种光亮的人,一个能听到“一千个萌芽,齐声歌咏着它们的每一份命运”的人,生逢其时而将革命者和诗人一起认取,不是像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自然而然吗?

### 盛成和瓦雷里的“跨文化佳话”

把《嬗变》一诗献给保罗·瓦雷里隐含着另一段“跨文化”的佳话。人们尚不清楚,同为1927年,盛成写作这首诗与他在巴黎大学开讲中国“群经之首”《易经》而令作为听众的瓦雷里惊喜交加,在具体时间上孰先孰后,但可以肯定,一年后《我的母亲》出版,历来以惜墨如金著称的瓦雷里亲撰万言长序,绝非个人之间的投桃报李。在这篇序文中,瓦雷里一方面盛赞作者“以一种最别出心裁、最细致入微和最巧妙的手法写就此书”,“揭示和彰显出一个时代诞生中的沧桑巨变”,一方面痛斥了其时西方世界对中华民族及中国历史文化根深蒂固的无知和偏见。他写道:“如果作者对我们相当了解,那么他是否借用他母亲的人与名,来触及到我们的灵魂呢?他从没有想到通过母亲的慈爱,委婉地使其转变为我们对博爱的笃信吗?我几乎不可能想象一个西方人,能够用最高尚的情感,毫无顾忌地对中国人倾诉衷肠。”

如此广博的理解和同情,如此深挚的自省和自察。我不知道就跨文化交流所可达成的效果而言,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反响更能荡涤我们的灵魂,更能从内部解放我们的创造力!请原谅我的发言变成了一个冗长的故事。但我相信

没有人会把这故事仅仅当成一个故事,而忽视它同时还是一种启示。所有的故事都趋向结束,而启示,则带来不断的开始和延续。当然,历史的场景、语境的上下文、主人公的身份和角色,可以诉诸的方式和手段,诸如此类都不妨变化也必然会变;但诗人关注人类命运及其心灵境遇的责任,诗歌不断突破既有边界,探询生命和语言的新的可能性的职份,由此生发出的跨文化写作与交流的强烈欲求和企及目标,却没有变也永远不会变。

最后请允许我回到已被搁置了太久的“蠕虫”。必须承认,当我前面说这一喻指“令人惊奇”时,其原本的喻指在我心目中早就发生了转移。我的意思是:对洞悉人类苦难、通晓中国古典,而当时又仍充满社会革命余绪的盛成来说,选择这一“齐物我”的喻象可谓其来有自,并不足以令我惊奇;真正令我惊奇的是,这一喻象似乎更适合用来象征今天诗和诗人的处境。我不认为这种误读有太多的悲观或自嘲的意味,毕竟,盛成笔下的蠕虫不是卡夫卡笔下的甲虫,正像它们隐身的洞穴不是甲虫背上的硬壳一样。现在,我甚至更真切地感受到了从那从内部鼓舞着它们的“神奇的动力”。

□唐晓渡(诗人、诗歌评论家)